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殷叙彝 主编

张小劲 李元庆 编译 殷叙彝 校



从职能社会主义 到基金社会主义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邓小平 邓小平 邓小平 邓小平 邓小平

从职能社会主义 到基金社会主义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殷叙彝 主编

从职能社会主义 到基金社会主义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
理论和实践

张小劲 李天庆 编译
殷叙彝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哈尔滨

责任编辑：汤 潮
封面设计：张乙迪

从职能社会主义到基金社会主义

Cong Zhinengshehuizhuyi dao Jijinshehuizhuyi

张小劲 李天庆 编译
殷叙彝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神呼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8 14/16 ·字数189,000

1989年 5月第1版 1989年 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2

ISBN 7-207-00961-5/D·133 定价：3.70元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编 殷叙彝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芸影 汤 潮 李兴耕 赵 曜

胡 瑾 林基洲 张契尼 周克明

顾家庆 黄安森 曹长盛 蓝 瑛

潘培新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阿德勒—卡尔松的《职能社会主义》和瑞典工会联合会研究人员鲁道夫·麦德纳尔的《雇员投资基金》两本著作。这两本书反映了瑞典社会民主党关于“瑞典模式”的理论和实践的两个不同阶段，是这一方面的权威性著作。卷末还附关于雇员投资基金的法令和瑞典工会联合会1986年发表的《三年来的雇员投资基金——评估报告》，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本书全部由英文版译出。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出版说明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是为发表国家七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当代社会主义流派研究》的成果而编辑出版的。

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科学界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有责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实际，对这一初级阶段的性质、特征、问题、发展道路和党的方针政策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而且要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流派相比较，同资本主义相比较，把现状同历史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具体的研究，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因此，这是一个涉及许多学科、跨度极大的理论领域，是可供社会科学工作者驰骋的广阔天地。国家社科规划设置的课题中，有许多是从不同角度涉及这一领域的各个方面的。《当代社会主义流派研究》这一课题所承担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即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个党派、思潮以及近年兴起的新社会运动的研究。我们对这些党派和流派探索符合本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采取尊重的态度，在这一前提下实事求是地分析它们的理论、纲领、政策和主张，探讨它们的成就、失误、问题和困难以及可供我国借鉴之处。这样的研究将能使我们扩大视野，吸取不少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并且加深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规

律和特点的认识,开阔我们的思路,有助于我们研究和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上述这些内容也将构成本丛书的主要选题。但是,这一课题涉及的面很广,与另一些课题有不少交叉之处,特别是与有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课题有密切联系,因此本丛书也将收入邻近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

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将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要在扎实地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对一些主要政党和流派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形成阶段成果,然后进行综合比较,写出体现本课题终极成果的著作。即使在课题任务完成以后,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仍将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继续进行下去,成为一个长期的研究项目。与此相应,我们希望能把本丛书编成一套体裁多样、内容丰富的丛书。它将包括最重要的基础材料,国外代表著作的译本、多种形式的专著和论文集以及综合性著作。这一任务是艰巨的,而直接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人员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希望学术界给予广泛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们能把这套丛书编好。

编译说明

本书收录的两本书和几个文件的译文，比较集中而且系统地反映了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工会运动对社会主义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的基本认识，反映了它们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为限制和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明显弊病而进行的探索。

《职能社会主义》一书的作者冈纳·阿德勒—卡尔松，1933年3月生于瑞典南部的海港城市卡尔斯门，后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律系求学，196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接着，他转向经济学研究，受教于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曾任瑞典社民党内阁大臣的冈纳·卡尔·缪尔达尔，在后者的指导下从事东西方经济关系的研究，并于1968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作为一个身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学者，阿德勒—卡尔松一向对党的纲领思想和政策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60年代中期蓬勃兴起的“新左派”思潮和以各种社会危机形式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的现象，对瑞典和西欧社会党的传统理论和战略形成了很大的冲击，迫使它们开始了“意识形态再思考”的过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参与接待拉丁美洲学生领袖并向他们介绍瑞典情况这一偶然事件萌发了阿德勒—卡尔松对民主社会主义“瑞典模式”进行新的理论概括的念头。1967年他发表了题为《运行中的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瑞典文小册子。在获得外界的好评之后，他又对此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于1969年以英文发表了我们在这里译出的这部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阿德勒—卡尔松提出了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的新看法。他认为，所有权并不是一个不可划分的整体概念，所有权实际上是与所有物相联系的一系列职能的总和。他还认为，对所有权问题的这种新理解可以引伸出结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完全没有必要在社会上实行全面的社会化，而只须对所有权的部分职能实行社会化”。在他看来，瑞典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来就是利用这种“职能社会化”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瑞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近了社会民主党人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目标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地位的改善和“机会的平等”。因此，他又比较详尽地论述了瑞典社会民主党根据这一方法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指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以及议会的特别立法已经在形式上仍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接受限制或与第三者分享权力，按照有利于全社会利益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

阿德勒—卡尔松还进一步论述了所有权的“职能”概念以及“职能社会化”理论。他认为所谓“混合经济”，其实质并不是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而是所有权职能的部分社会化与非社会化的共存。他认为东西方之间“趋同”现象的存在既不是指所有制的变化，也不是指个别因素的发展，而是指所有权职能社会化与非社会化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一致。由此他强调“职能社会主义”在理论方面的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他论述了“职能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所具有的实践意义。他认为，“职能社会化”的方法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和内部封建关系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可以使东方国家提高自己经济组织的效率，同西方国家进行有益的经济交往；也可以使西方国家消除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弊病，最终比较彻底地剥夺资本家过于集中的经济权力，使之名存实亡。

由此可见，阿德勒—卡尔松的这部著作既有具体的政策分析

内容，也不乏抽象的学术理论阐释，不仅比较详尽地描述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而且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因而此书一经问世立即得到国际上的重视。在短短的五年之内，这部著作即已连续再版10次，先后被译成7国文字。从此，“职能社会主义”成为国际社会党人有代表性的一种理论。

应当看到，“职能社会主义”理论从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入手探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和限制问题，这一特点确实反映了瑞典乃至西欧社会党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及其根源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反映了他们既要代表广大人民的要求，努力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但又不愿采取激烈的行动，以免引起资产阶级强烈反抗的思想顾虑。也还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党人曾称赞“职能社会化”是“依靠资本为生者无痛苦死亡的有效方法”。因此，阅读此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瑞典社会民主党理论和实践的大致内容和主要特点以及在新的条件下所发生的演变，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由此所反映出来的西欧社会党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趋势。此外，阿德勒—卡尔松在书中从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融合中对所有权问题的论述，在谈到东西方经济交往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时提出的一些见解，对我们今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不无启发。这就是我们将此书译出并推荐给读者的主要原因。

当然，“职能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明显的缺陷和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在强调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同时，阿德勒—卡尔松仍然主张这种所有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认为资本家集团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论述“职能社会化”方法的具体运用时，他过于强调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机器和法律的超阶级性。同时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

国家、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有不少误解和偏见。我们相信，读者自己对这些是会鉴别的。

在政策主张方面，“职能社会主义”显然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战略持肯定态度。确切地说，阿德勒—卡尔松无非是从新的角度论证了社会民主党几十年的改良实践。但正如社会现实的发展已经暴露了社会党传统战略的局限性一样，“职能社会化”在实践中并未显示出象阿德勒—卡尔松所说的那种神奇效力。他自己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他在1986年为联邦德国出版的《社会主义词典》写的“职能社会主义”条目中指出，“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实证理论，职能社会主义取得的成果不大”。他在这一条目中概括叙述职能社会主义的几个理论要点时，更多地强调了它作为一种东西方之间“趋同”理论的意义。他在关于“瑞典模式”的条目中也对这一模式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未能真正解决不同社会集团特别是劳资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税收的再分配有很大的局限性，过分强大的国家干预使人感到个人自由受到限制等等。为了使读者能了解阿德勒—卡尔松理论观点的发展变化，我们将这两个条目（由殷叙彝翻译）作为《职能社会主义》一书的附录收入本书。

70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党掀起了一个经济民主化的高潮，先后通过了在当时西欧属于最为激进的若干经济民主化立法，力图凭借这些立法使工人及其工会代表参与公司、企业和车间的管理和决策。但接踵而来的经济危机以及社会民主党执政地位的丧失，使这些立法形同虚设，难以真正贯彻。在这种情况下，瑞典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开始探寻更彻底、更直接、更牢固地改造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扩大经济民主的新途径。

可以说，被西方人士称为“基金社会主义”的“雇员投资基金”就是这种探寻的结果。这一新事物标志着瑞典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运动关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问题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同时，在西欧社会党为摆脱类似困境、寻找新出路而正热烈进行的“社会所有制”问题讨论中，“雇员投资基金”也以其系统的构思、周到的考虑引人注目，具有较大的影响。

本书收录的《雇员投资基金—集体资本形成研究》是所有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中最全面、最具有权威性的一部。作者鲁道夫·麦德内尔原居德国，青年时期即参加工人运动和进步性的社会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躲避纳粹政权的迫害而移居瑞典。在这里，他积极参与了瑞典工人运动，利用自己的专长从事工会工作并在其中崭露头角，很快便负责工会经济政策的咨询和论证，成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及工会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专家中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早在 50 年代末期，麦德内尔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敏感地认识到，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会将面临如何控制大企业超额利润的问题。因此，在 1961 年瑞典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他起草了一份给工会中央的报告，建议就超额利润进行谈判以设立部门性的工会基金；1967 年他再度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形势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人同样意识到这个问题。到 1971 年，瑞典最大的行业工会—金属工人工会在当年的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应当研究既要限制财产集中、又要鼓励投资的方法问题。因此，麦德内尔早先的想法受到重视，他受命为 1976 年的下次代表大会起草报告，就上述问题，特别是借助某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来抵制财富的不断集中并扩大工人在企业决策中的影响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由麦德内尔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 1975 年 8 月推出了这个以“麦德内尔方案”著称的报告。

根据这个报告，瑞典工会在当年年底至次年年初组织了有 10 万工人参加的讨论并向 1 万 8 千雇员作了书面调查。1976 年 7 月举行的代表大会接受了这一报告，同时联合会全国执委会的决议

还强调：“麦德内尔方案确立了建立雇员基金的原则和设想”，并且要求以此为基础进行补充和完善。

在这种形势下，瑞典社会民主党与工会联合会联合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到1978年4月，联合小组提出了拟就的共同报告《雇员投资基金与资本形成》，基本坚持了“麦德内尔方案”的原则立场，但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有关具体问题上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虽然当年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讨论联合报告时认为，以此为基础作出正式决议的条件尚未成熟，虽然种种情况表明设立雇员投资基金一事不会列入社民主党1979年大选的竞选纲领，但联合报告的提出和代表大会的讨论足以证明，社会民主党已开始比较积极地介入此事，基金由设想变为实际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因此，雇员投资基金的设立与否和利弊如何便迅速成为瑞典各社会阶层、各派政治力量普遍关注并为之展开激烈争论的问题。

与此相应，瑞典工会运动关于雇员投资基金的主张在西欧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在1973年提出过向企业课税以建立全国工人基金建议的英国工党和工会运动中，瑞典的事态发展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麦德内尔方案”的英文译本因而也在1978年出版。现在，我们又将其译为中文奉献给读者。

在这个报告中，麦德内尔首先指出了瑞典工会运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论证说，工会运动自50年代以来提出并作为同资方进行工资谈判指导方针的“团结一致工资政策”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一政策要求工人工资的数额随劳动性质而定，而不是取决于个别企业的利润水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它在全国范围内缩小了工人工资的差别，使工人的物质利益趋于一致，因而有效地加强了工会组织内部的团结，同时又加快淘汰了单纯依靠低工资的低效益企业，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使那些生产技术先进、工人单员生产值和利润较高的大公司不必向工

人支付与利润水平相当的工资，因而可以获得大量的“超额利润”。在90%以上的工商企业由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的集中程度一向较高的瑞典，“超额利润”的存在明显加剧了财富和权力集中化的发展趋势。这同工会运动的理想恰好是背道而驰的。因此，麦德内尔明确肯定，工会运动应当努力实现三大目标，即完善“团结一致工资政策”；制约私人企业金融完全不受控制而产生的财富集中及相应的权力集中；加强雇员在生产过程中的影响与权力。接着他论证了在瑞典现时条件下，雇员基金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好手段。按照麦德内尔的设想，国家通过法令规定，企业部分利润的所有权应当以股份转让的形式从雇主私人手中转到雇员基金手中，成为雇员的集体财产。据测算，当企业利润率为15%—10%而对利润的征收率为20%时，雇员基金可在25—35年之内占有企业股份的50%。这样一来，企业的巨额利润就不再完全是促进财富和权力集中的有利条件，在股份经济发达的今天雇员基金很快就可以集中利用已有的股份对企业事务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麦德内尔在论述雇员基金设想时尤其强调两大原则，一是集体主义原则，即由征收利润而建立的基金必须属于集体财产而不能由个人占有或用于个人消费；基金收益应当用于集体福利。唯有如此基金才能成为促进工人团结的工具。二是民主化原则，即基金占有企业股票的主要目的是使雇员能够在股东大会和公司董事会中发挥影响，加强雇员的发言权，从而改变过去权力过分集中于资本家个人手中的状况。此外，麦德内尔还针对瑞典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使雇员基金的设想更加全面、详尽和实际。

应当指出，麦德内尔的这个报告提出了许多值得肯定的问题。就其主要目标而言，雇员基金代表了瑞典工人运动对其传统战略的突破。虽然自30年代以来，瑞典工会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建立和完善了通过集体谈判确定工资和解决劳资纠

纷的制度，迫使资本家不得不经常作出让步，但这种做法毕竟没有触动资本家对企业财产和管理的特权。而基金却直接向这一特权发起了冲击。就其集体主义原则而言，雇员基金决不同于分散的个人持有股票的“人民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以此为基础的各种雇员股份分红制、个人利润分享制等。它坚持了集体所有权的形式，构成了企业内部与资本抗衡的经济成分。就其建立方式而言，雇员基金无偿占有利润的特点不同于西方国家曾有过的国有化改革，带有一定程度的“剥夺剥夺者”的色彩。

如果说“职能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多少超越了早期的“福利社会主义”，那么雇员基金对“职能社会主义”又有某些突破。因为它不仅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从纯粹的分配领域引入了生产和所有制领域，而且要在改变所有制构成的基础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可以说，雇员基金更直接、更全面、更深刻地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将雇员基金方案称之为“基金社会主义”的不乏其人。读者由此也不难发现，在瑞典这样尚不存在爆发暴力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的国家，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他们总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自身的壮大成熟寻求新的方法和手段以更彻底地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建设更加美好的新社会。读者同时还会发现，雇员基金设想在许多具体方面为我们今天深化改革，在企业所有制问题上进行股份制、合资制尝试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之处。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麦德内尔的雇员基金设想也反映了瑞典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在瑞典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因而也带有改良主义的色彩。而随着基金从理论设想到实际立法的发展，雇员基金的意识形态考虑有所淡化，一些较为激进的具体措施也有相当多的修改。例如，前面提到过的1978年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联合会的联合报告，在麦德

内尔所提的三大目标之外，又补充了“增加投资基金”的目标，将基金正式定名为“雇员投资基金”，强调它对解决瑞典经济增长势头软弱、工业投资不足的作用。1981年党和工会的联合研究小组发表了新的报告《工人运动与雇员投资基金》，主要在基金的资金来源、对企业利润的征收率、基金投票权的使用等方面作了重要修改，突出了基金的局限性。1983年6月社会民主党研究机构起草的作为法案提交议会表决的报告以及同年12月议会最后通过的有关法令，与“麦德内尔方案”的差别进一步加大，基金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受到限制。对此，许多工人也表示了失望。

但读者更应当注意的是，雇员投资基金毕竟是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主要由工人阶级发起的对现存经济制度、财产关系和权力结构实行变革的一次尝试。它的主要意义和深远影响不应低估。1983年10月4日主要由瑞典企业家构成的基金反对者在斯德哥尔摩组织了一次有7.5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开创了西方国家资本家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的先例；1983年12月12日议会表决时三个非社会主义政党持坚决反对态度，基金法令仅以6票多数勉强通过；1984年1月1日有关法令生效后，实际设立基金的工作和基金组织开展的经营活动又接连遇到人为制造的许多困难。这些事实不正好说明了基金的性质和作用吗？更何况在西欧几个国家的工人运动也已提出类似主张的时候，瑞典率先以立法形式肯定并实际设立了雇员投资基金，这一事实不正好说明了资金所带有的历史性突破意义吗？正是因为这样，瑞典工人在流露失望心情的同时更多地是为基金的建立及其在困难中的顽强发展感到欣慰。

为使读者对雇员投资基金问题有全面的了解，我们在此还一并译出了瑞典议会1983年12月通过的有关法令以及瑞典工会联合会总结1984年至1986年基金情况的文件《三年来的雇员投资